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HYGIENIC MODERNITY

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美〕罗芙芸 著

向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HYGIENIC MODERNITY

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美」罗芙芸 著

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美] 罗芙芸著；向磊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 - 7 - 214 - 04716 - 8

I. 卫… II. ①罗…②向… III. 通商口岸—医
学史—中国 IV. R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201 号

Hygienic Modernity by Ruth Rogaski

Copyright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6 - 325

- 书 名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著 者 [美] 罗芙芸
译 者 向 磊
责任编辑 王 田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2
字 数 33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716 - 8 .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致 谢

本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联盟的 Philip E. Lilienthal 亚洲研究基金会提供了大量帮助,该基金会的捐助人为 Sally Lilienthal 女士,特此予以致谢!

序 言

孙真人卫生歌

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兮足象地，
父母遗体宜宝之，箕裘五福寿为最。
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
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
欲求长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
木还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还延命。
贪欲无穷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
劳形散尽中和气，更仗何能保此身？
心若大费费则竭，形若大劳劳则怯，
神若大伤伤则虚，气若大损损则绝。
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
心诚意正虑自除，顺理修身去烦恼。
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吹肺肾宁，
四季长呼脾化食，三焦嘻却热难停。
发宜多梳气宜炼，齿宜数叩津宜咽，
子欲不死修昆仑，双手揩摩常在面。
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咸，
夏要增辛宜减苦，秋辛可省但教酸。

2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季月少咸甘略戒，自然五脏保平安，
若能全减身康健，滋味偏多无病难。

.....

恩爱牵缠不自由，利名萦绊几时休，
放宽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早白头。
顶天立地非容易，饱食暖衣宁不愧，
思量无以报洪恩，晨夕焚香频忏悔。
身安寿永福如何，胸次平夷积善多，
惜命惜身兼惜气，请君熟玩卫生歌。^①

^① 《孙真人卫生歌》，胡文煥编，《类修要诀》，胡文煥，《类修要诀》（1600年；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9）；重印见周守中（1208）编，《养生类纂》，和胡文煥编，《类修要诀》。

目 录

序言 / 1

导言 / 1

第一章 “包治百病”：20 世纪前的卫生 / 24

第二章 天津的卫生与疾病 / 51

第三章 医学的遭遇与分流 / 80

第四章 中国通商口岸的卫生翻译 / 111

第五章 日本明治时期卫生翻译的转变 / 145

第六章 缺陷和主权：天津被占领期间的卫生现代性，1900—1902 /
176

第七章 可见与不可见：城市景观和卫生的边界 / 207

第八章 卫生和现代性的渴望 / 239

第九章 日本人在天津的细菌管理 / 269

第十章 细菌战和爱国卫生 / 302

结语 / 318

参考书目 / 325

导 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将卫生和疾病的含义置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中心。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在于聚焦一个中国词语：**卫生**，彰显其跨时间的多样性。今天，这个词语在英语中的译法不一：“卫生”、“清洁”、“健康”或者“公共卫生”。而在 9 世纪以前，**卫生**则同各种各样的饮食、静思、秘制方药等养生方有关，人们为了保护脆弱的生命而实践这些养生方。随着武装的帝国主义的到来，中国及中国人开始紧密地围绕着这一词语而展开如何实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争论。它的含义偏离了中国的宇宙观并转而包含了国家权力、进步的科学标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健康。卫生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问题息息相关，启发我将之译为“卫生的现代性”。本研究揭示了卫生如何改变了一个城市，以及它如何成为一个中心词——通过这个词，中国的精英分子在 19—20 世纪帝国主义统治下，“确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①

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无法不关注**卫生**。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形容词/名词，它并不能同 *hygiene* 这个词严丝合缝地对应。人们可能会看到**卫生**筷子（用廉价木材制成，裹上纸袋，并只供一次性使用）、**卫生**纸（厕纸）以及**卫生**球或樟脑丸。一个人要做“**卫生**”（打扫卫生或搞卫生），指的是对家具或办公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私家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评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28 页。

的浴室以及公共场所的厕所被称作卫生间。

- 2 对医疗行业、医院、传染病控制以及制药标准加以监督的国家政府机关叫做卫生部，市和县有各自的卫生局，负责各地区的公共卫生事务。尽管很多时候，卫生可以（且应该）被简单译成“卫生/卫生的”或“清洁/清洁的”，但它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存在则显示了一种超出当代美语中这些语汇所表达的仅仅对清洁关注之外的重要性。

或者，正是它广泛地使用并结合了“民族”、城市甚至是国家意义，使得卫生本身在当代中国争取实现看似总是难以把握的现代性状态的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屡见不鲜的市政运动呼吁民众“讲卫生”，提醒人们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人们应该勤洗手，保证居室卫生，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随地吐痰。画在墙上和建筑物上的标语呼吁居民们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并把这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同某些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国人谈话时，你会发现这些人对新加坡啧啧称美，因为它是个卫生城市，对中国则有所不满。并且，尽管后邓小平时代大部分群众卫生运动已经杳无影踪，政府仍然定期地发动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此作为改进中国的健康、形象及国家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这些表述中，卫生是定义现代性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是对个人而言的，也是对城市的建筑环境甚至想象中的国家整体而言的。“卫生”的这一含义远远超越了19世纪末以前与这个词相关联的那些含义。

本研究试图理解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这些新的含义开始同卫生一词联系起来。理解这一过程或许能够使19和20世纪中国城市社会及知识变迁的基本性质更为明晰。费惟恺(John Fitzgerald)描述了20世纪的民族精英们如何担当起“唤醒”的任务，将中国从蛰伏的困境中唤醒。精英们认为，这种困境来源于中国人天生的虚弱。^①本研究认为这种“唤醒”计划的大部分是围绕着“卫生”这一术语

^① 费惟恺，《唤醒中国：民族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Awak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term)展开的。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国的精英分子接受了有关国家问题的医学化观点(medical view),并转而试图以医学化方案解决中国国家及机构的不足。通过聚焦于一座通商口岸城市的医学发展,本研究考察了这个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过程,即卫生和疾病在帝国主义情境之下,既呈现为中国积贫积弱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通过特定的任务“唤醒”中华民族、种族以及身体,实现身体的现代性的中心议题。^①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卫生含义的变化置于催生这些含义的都市环境中。20 世纪早期涌现了一批有关健康和卫生的著述,但这些著述的作者们生活在被传染病、坟地、洪水、市场、街道、庙宇、妓院和外国人包围的环境中。为了抓住这一情境的要义,我集中于一个地点:北方的通商口岸天津,它曾经、现在也仍然是一个熙攘的城市,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从 1860—1943 年,该城也是一个典型的通商口岸,被划分为华界及九个不同的外国租界。随之而来的边界、建筑和政策多样性的华洋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帝国主义下中国的独特经历——并非殖民地,但却存在着多样的殖民主义。天津为我们研究所谓的“半殖民主义”的情境提供了绝佳的背景。^②

将研究置于某一地也有助于产生按照时间变迁为序的叙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天津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遭遇和影响的时刻:1858 年随英国海军传入的“西医”,1900 年

① 一些学者,最著名的是冯克(Frank Dikötter),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的健康、疾病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他关于知识分子历史的开山之作中,冯克发现了前现代的中国先行者们所持有的种族和性别等级观念的不同。同时,他证明了剧变发生之时,这些观念正成为科学话语的一部分。见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ity China*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 Hurst and Co., 1995); 和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8)。

② 要了解这一说法的谱系,见 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Wolfgang Mommsen 和 Osterhammel 编(伦敦: Allen and Unwin, 1986)。

外国军队的占领及 1902 年清政府收复该城,1930—1940 年代日军的占领。本研究描述了这些政治事件和与卫生相关的行为转变——服药、饮用水、空间安排、粪便处理——之间的交叠。在这一叙事中,我仍对精英们如何赋予这些变化以超出其本身影响之外的重要意义相当敏感。总的来说,地方史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同时考虑世俗(如果不是粗俗的)及超凡的意义:它既调查人们去哪里沐浴,也研究人们如何想象国家。本研究试图找出这二者之间有意义的关联。

- 通过卫生现代性的线索将个人与国家相连结,这一工作牵涉不同
- 4 学术问题的若干阶段及特征。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卫生现代性的转变置于一般意义上的医学史及特殊意义上的殖民地医学史的双重背景下。它逐渐偏离于健康及卫生的古老含义,这是一种全球现象,但对于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而言,该现象具有特殊含义。第二项任务是思考,随着卫生成为文明及主权的一种标识,卫生现代性如何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及人文景观。最后,文本的翻译有助于创造有关**健康**和**卫生**的新的含义,这并非通过两种单一文化的合成或将一种绝对科学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达成,而是在地方科学及地方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些极为特殊的时刻,两种语言含义达成协商的结果。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故事有赖于三种学术研究的融汇:医学史、城市史和翻译研究。

卫生的(全球)转变和(中国)缺陷的产生

1220 年,成吉思汗遣密使刘温持虎头金牌,率二十名武士,去其山东老家的家庙寻找一位叫做丘长春的道长。经过极为艰险的千里跋涉,他们终于将道长带到了撒马尔罕的帐篷里蒙古统治者的面前。据长春的一位弟子记载,他们最初的对话如下:

皇帝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

道长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①

成吉思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生的灵药，或曰长生之道，这并不令人惊奇。到13世纪时，已经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及民间故事是关于帝王们想从道家那里求取长生不老之方的。在其建立欧亚大帝国的计划中，成吉思汗希望将中国最珍贵的资源为其所用——包括即便不能永生，也能够使他长寿的方法——这是很正常的。在回答中，长春真人大胆地双关回应了皇帝，回答说尽管没有长生（即延长生命）的药（道），但是却有卫生（即保卫生命）的道。道长给了他一个养生方，能够强化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延缓衰老，并能使可汗比天赋之寿命活得更长。长春劝告成吉思汗要警惕性的危害（独居一月，你会惊奇地发现精神和体力都有所增强），讲述了应时的简单饮食的益处，并宣扬静思的好处。^②本质上，这是对中国人卫生之道的总结。

正如有关长春真人的典故中所讲述的，卫生曾经是一种自信的、中国式的“长生之道”，是一套同中国文化密切相连，并被外邦觊觎的先进的养生之术。不过，到了20世纪，卫生却成了体现中国积弱的一种话语：一把打量中国同外国人定义下的现代性之间差距的标尺。20世纪卫生的含义有所转变，它包括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20世纪中国精英分子有关卫生的著述中，都显而易见地表达出，在他们的理解中，不如想象中的西方那样清洁，有组织，又纪律和健康。目前的研究追溯了这一语言乖离中所体现的讽刺及历史意义。

当然，在近代，卫生一词的内容不仅仅在中国一地发生了变化。安德鲁·威尔（Andrew Wear）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卫生的含义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古代到前现代，卫生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保健行为，如运动、饮食和休息。威尔观察到，如今，“卫生意味着清洁，

①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Arthur Waley（伦敦：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931），101页。翻译有些微调，中文原文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1228，《国学基本丛书》，349卷，王云五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上卷16。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24页。

其范围变窄了。”^①①卫生在西方和中国的语义转变是相似的,但在这两个地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寓意。

6 长春对成吉思汗的卫生建议同西方人对卫生的古典看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道长告诫这个蒙古人要节制饮食、应时而动并节制性欲。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文章《健康养生法》(*Regimen in Health*)(公元前5世纪)中,也提倡人们调整饮食、睡眠和行为结构,顺应天时及自身的体质。这些著述简述了食物和药物的不同属性,规定了沐浴的大致时间,并就性生活的适当频率给出了意见,就像道长劝告成吉思汗的那样。公元2世纪的罗马医师伽林(Galen),在其论文《卫生》(*De sanitate tuenda*)中提出要节制运动和饮食。在《医学的艺术》(*Ars medica*)中,伽林确定了六类范畴,即空气、饮食、睡眠、运动与休息、分泌与排泄以及灵魂的热情,他认为这六类事物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也成为后来著名的“六经”健康的基石。节制和应时是这一卫生哲学的口号。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常识的持续关注,成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有关保健类的著述的典型特征。近代早期涌现了一大批卫生劝诫的书籍,其中一些对于自古以来

的养生方有着不同的记载,但学者们认为,进入18世纪后,整体路径基本没有偏离伽林所提出的卫生概念。^②

随着18世纪法国、英格兰和普鲁士“公共卫生”方面的发展,卫生之道出现了重大转变。在一些官员、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看来,最重要的健康是民族的健康。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卫生监督、公共事务和发展

① Andrew Wear, "The History of Personal Hygiene",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第二卷, Roy Porter 和 W. F. Bynum(伦敦: Routledge, 1993), 1283—1308。

② 作为一份优秀的欧洲卫生史的学术研究,见 Heikki Mikkeli, *Hygien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cal Tradition* (赫尔辛基: Academica Scientiarum Fennica, 1999)。Henry Sigerist,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Hygiene*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6), 是一份重要著作的便捷摘要。关于自然的变化(主要是从热到冷),见 Virginia Smith, "Prescribing the Rules of Health: Self-Help and Advic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s: Lay Perceptions of Medicine in Pre-industry Society*, Roy Porter 编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

国家支持的医疗机构,来防止民族机体的疾病。^①与此同时,卫生更多的同清洁、礼仪及阶级地位相联系。后来,对细菌的惧怕,增进了人们对清洁的关注。^②到20世纪中期,英语中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健康的分散的类别,这些词汇构成了两个世界:公共卫生的广阔领域和个人卫生的狭窄空间。整体医学的概念基础——对体液和季节的关注——基本消失了,并且也不再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词语能够表示通过饮食、运动、休息及节制而达到的健康之道。

研究西方医学传统的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这些转变。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其对健康及治疗的普遍看法的研究中,强调了18世纪的病人对体液和平衡的永久信仰,即便当时很多医师已开始抛弃伽林式的身体观。^③罗森柏格(Charles Rosenberg)等人已注意到,尽管受到巴黎医学发展及德国细菌理论兴起的影响^④,19世纪的美国医师仍然不肯放弃体液和整体的医疗途径。这些现象在极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过渡阶段,是传统的过去与注定到来的医学现代性之间的时差。医学人类学家认为这一转变在非专业的大众之中并不彻底,而研究“医学边缘”的历史学家则强调19世纪抵制“医学正统性”^⑤霸权的运动与日俱增。但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对“现代医学兴起”(特别是现代治疗学)的集中关注,导致其完全忽视了预防医学史,以及健康意义普及中的变化。现代生物医学及国家的公共卫生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心

① 西方公共卫生的总述,见 George Rosen,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1958;重印,巴的摩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和 Dorothy Porter,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伦敦: Routledge, 1999)。

②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伦敦: Blackwell, 1993); Nancy Tomes, *The Gospel of Germs: Men, Women, 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 (剑桥, Mass.: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

③ 见,例, Roy Porter 和 Dorothy Port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50—1850* (伦敦: Fourth Estate, 1988)。

④ Morris J. Vogel 和 Charles E. Rosenberg 编,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Medicine* (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9)。

⑤ Emily Martin, *The Wome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波士顿: Beacon Press, 1987); Roger Coot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Basingstoke: Macmillan, 联合牛津圣安东尼学院, 1988); Andrew Wear, *Health and Heal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tudies in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Brookfield, V.: Ashgate); W. F. Bynum 和 Roy Porter 编, *Medical Fringe and Medical Orthodoxy* (伦敦: Croom Helm, 1987)。

约定成俗地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同时西方古老的卫生之道逐渐褪去踪影，这一过程并未遭遇太多困难和抵抗，也未对社会整体产生太多影响。

然而在非欧洲社会，对健康和医学的历史研究则并不这样乐观了。欧洲的健康和治疗方法被带进了本土社会^①，使许多研究“殖民地医学”的学者受到冲击和置换。这方面的经典研究要数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1993年的著作《身体的殖民》(*Colonizing the Body*)。阿诺德强调，随着英国行政官对印度人进行统计、隔离、接种疫苗及检查，英国的殖民主义体现在身体方面。尤其是在像腺鼠疫等传染病爆发的时候，西医及西方的疾病预防方法体现出“对身体的侵犯”，这是以现代的健康和卫生为口号，粗暴而强迫地对身体进行殖民。其他学者，最著名的如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和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也同样强调指出殖民地医学对非洲和东南亚的干涉，英国传教士或美国军队对当地人口进行血液和粪便检查。这里，焦点投射在西方话语的发展，这一话语将当地人口转变为不健全且混乱的医学客体(object)。② 由于当地人民对殖民医学干涉的反抗和抵制，阿诺德也将印度人的身体视为“争论点且不仅仅是殖民僭用”。不过，他指出，西医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新兴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渗透到了有影响力的那部分印度人的生活”。尽管在这本书中，他更感兴趣的是描画殖民者的意图，以及“大众”的反应，而不仅仅是考察印度精英对西医的接受。③

① 这些著作的例子包括 David Arnold 编, *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88); Roy Macleod 编,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伦敦: Routledge, 1988); Mark Harrison,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Anglo-Indian Preventive Medicine, 1859—1914*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柏克利和洛杉矶: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3); Ken De Bevoise, *Agents of Apocalypse: Epidemic Diseas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普林斯顿, 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5); 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② 特别参见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and Warwick Anderson, “Excremental Colonialism”, *Critical Inquiry* 21, no. 3 (1995): 640—669。

③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4, 8, 211.

其他学者也承认了殖民地公共卫生的强制性和干涉性,但他们却转而强调当地人民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即僭用及改造殖民者赋予的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本土的精英们“质疑殖民霸权”,并且通过生产混杂的医学形式,使殖民地医学成为一种“有争议的知识”,或者,在其自身传统内部寻找批判西医体系的基础。^① 这些争论和组合常常通过翻译过程实现。在布赖迪·安德鲁(Bridie Andrew)颇具洞见性的研究中,他论证了中国的医师是在中文框架内来翻译细菌理论,从语言学上将细菌概念化为类似于分离的、动物一样的病原体,这种描述在盛行的病原学中已经很常见了。^② 普莱克希(Gyan Prakash)强调印度精英是如何通过翻译过程,对西方科学是否拥有对真理——尤其是关于身体机能的真理——的霸权表示怀疑的。^③ 南迪(Ashis Nandy)也强调甘地等人如何利用印度的卫生哲学达到对西医的深刻批判。^④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本土的行为者都从深深根植于健康、医疗和卫生的强大的本土实践的立场来形塑和置疑西方知识。

“身体的殖民”和“质疑殖民霸权”这两种倾向都普遍存在于19—20世纪中国人对西方卫生之道的感受中。很多时候,殖民者“接触身体”并且对不顺从的人民施加医学控制的高压政权。中国的医学思想家也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的卫生概念来挑战并重塑西方概念。不过,当我们关注于贯穿长时段的某一特殊背景时,某些普遍的趋势就会变得更为明显。许多研究都集中在欧洲医学和本土医学“交汇”的单独时刻:某一套特殊的翻译词汇、某次特别的传染

① 这种方法,参见 Dagmar Engels and Shula Marks 编, *Contesting Colonial Hegemony: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and India* (伦敦: I. B. Taurus, 1994); Bridie Andrews 和 Chris Cunningham 编, *Western Medicine as Contested Knowledge* (曼彻斯特与纽约: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7); Bridie Andrews, “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2, no. 1 (1997): 114—157。

② Andrews, “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

③ Gyan Prakash,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普林斯顿, 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9)。

④ Ashis Nandy, “Modern Medicine and Its Non-Modern Critics”, 载 *The Savage Freud and Other Essays on Possible and Retrievable Selves* (普林斯顿, 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5)。